

革命經歷片斷

1903—1908

博布羅夫斯卡婭著

243

人 民 出 版 社

革命经历片断

1945—1948

陈克明著 四十周年纪念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革命經歷片斷

1903-1908

博布羅夫斯卡姬著

蔡詠春譯



人民出版社

1956年·北京

Ц.С.Бобровская (Зеликсон)
СТРАНИЦЫ ИЗ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ШЛОГО
1903—1908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5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译出

148.32

革命经历片断

1903—1908

〔苏〕博布罗夫斯卡娅著

蔡咏春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 $2\frac{1}{2}$ • 字数47,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0.24元

统一书号11001 • 139

校对者：魏再思



目 錄

在特維尔党組織·····	3
日內瓦——柏林·····	8
在巴庫党工作上·····	18
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裝起义的日子里·····	31
在科斯特羅馬党組織·····	49
在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紡織工人中·····	58
在莫斯科縣党委会·····	70



提到俄國第一次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日，思想不由自主地回溯到那些遙遠的、然而又是永遠忘記不了的日子裡的經歷。

1903年夏天……在彼得堡審訊前的拘留所……被囚的人們剛剛結束了六天的絕食；由於這次的絕食，檢察機關答應立刻審理我們的案件。這就是說，我們很快就要離開這個審訊前的拘留所而去候審了，然而現在，彼得堡白夜的迴光卻穿過單人禁閉室的鐵柵欄映照進來，形成一塊塊離奇的淡青色的方塊，靜對着我們。這几夜我完全沒有睡着，心里老是想着、想着……。

國外那邊，我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不久就應當召開了。我們，黨的工作人員，對於這次代表大會寄與很大的希望。這次代表大會應當結束國內已經展開的廣大工人運動和黨的現況兩者之間那種有害的不相適應的狀態，因為黨內存在着許多各自為政的地方委員會，它們都妄想使動作起來的工人羣眾受自己的影響。

當時我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方面都強烈地感覺

到，所有在集中的战斗無產階級的党的旗帜周圍奋斗着的人們必須刻不容緩地團結起來，而且，我們想，以“火星報”作為組織者和思想上的鼓舞者的代表大会，应当把这面旗帜高高地举起。本來“火星報”的影响已經順利地滲入了國內各無產階級中心所有的黨組織，而且这些組織已經一个跟着一个正式表示它們完全拥护“火星報”。例如，1902年10月，“火星報”上登載了俄國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員會關於承認“火星報”為領導机关報的聲明。俄國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員會也聲明完全拥护“火星報”，并且在这个聲明里強調指出“火星報”立場的原則性，贊成它為團結現有黨組織所作的努力，贊成它對“經濟主義”的劇烈的批評，以及它對社会革命黨人和對他們的個人恐怖策略所持的反对態度。其他黨委會也發表了類似的聲明。

我們對第二次代表大会寄與巨大的希望，因而後來當代表大会上發生分裂的最初消息開始透露到各地時，我們的失望也就更加厲害。

絕食終止以後不久，我和別的一些人被釋出獄，但是有一個條件——必須即刻離開彼得堡，並且在審訊以前不許住在設有大學的城市或任何工業重鎮。



在特維爾黨組織

我選上了特維爾（加里寧），因為這個市對我來說有許多優點：它離彼得堡和莫斯科近，有一個大工廠（莫羅佐夫紡織廠），還有，在我被捕以前，作為“火星報”的代辦員，我和特維爾黨組織有過關係，若干姓名住址我還記得。這使我有可能是不用特別費力就可以恢復因被捕而中斷的種種聯繫。所有這些優點都沒有被暗探局“警惕的眼睛”看穿，我就決定住在特維爾了。

我在這裡安頓下來，運氣還不錯。我找到了一間租錢不貴的房間，尤其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事。雖然在1903年的時候，專門從事黨的工作的人們，即職業工作者，生活已經由黨的經費供給，但是這只限於秘密工作者。只要一個工作人員被認為合法，哪怕是暫時地，他就認為不宜從黨庫領錢，而當你處在警察監視下，黨組織不能使用你來做需要你做的事的時候，尤其是如此。

我在地方自治局找到保險統計方面的工作。由於工作是臨時性的，不須經過省長的批准，因此完全“不可靠”的人們，甚至剛剛離開監獄鐵柵欄的人們也可以在這裡工作。

我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以后（我不久就被任为该党委会委员），便知道了拟派亞力山大·古謝夫做代表出國参加代表大会的消息；他从前是一个工業技術学校的学生，因为革命活动被开除出校，被捕以后，在警察監視下从彼得堡被流放到特維尔來。但是这个監視並沒有妨碍他立即参加党的工作，这工作他不停手地干了好几个月。像这样的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我們全体都贊成。預备好了秘密越过國境所需要的有关地址，少数款項，和可以帮他和“火星报”編輯部取得联系的暗号以后，他在警察不覺察之中离开了特維尔。

古謝夫同志答应，一俟越过國境就要报告消息，可是他的消息却迟迟沒有來，这不由得引起了我們的担心。后来很快地就判明，我們的担心沒有錯，因为我們的代表遭到了極其不幸的事。当他越境的时候，他受了很重的感冒，病得很厉害，在几乎不省人事的状态下到达日內瓦，在那里他沒有恢复知觉，兩天以后就逝世了。

古謝夫同志去世的消息在我心中引起了难忍的痛苦。亞力山大·古謝夫僅僅才二十三歲。他是一个真正的黨員，理論上有良好的修养，把全部精力都献給了党的工作。像这样的人那时还不多，而我們却常常不得不丧失他們：監獄、流放、非法状态下的漂泊生活、經常的半飢半飽和睡眠不足——这一切都損伤元气，而且往往直接導致同志們的死亡。

同时，未經証实的消息开始傳到我們那里，說在代表大

会上，党的力量一点也沒有集中起來，說“火星報”本身發生了裂痕，說大會的結果是：我黨分裂成為兩派，這兩派已經在國外進行着殘酷的鬥爭。這些話我們不願置信，可是不久我們就收到關於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一切的詳細報導。

遠在代表大會以前，特維爾黨組織就和“火星報”編輯部保持經常的聯繫，一向親切地接待有時到它那里來的“火星報”代辦員。該報許多期上刊登了特維爾通訊——來自莫羅佐夫工廠、車廂制造廠及其他企業。

特維爾黨委會和莫羅佐夫工廠的工人有相當廣泛的聯繫；該廠不但有宣傳員性質的小組，而且有由先進工人組成的有組織的核心；在這個核心的幫助下，委員會得以散布“火星報”的和自己的單張印刷品。特維爾黨委會的傳單總是幾百份幾百份地散發出去，雖然這些傳單必須用原始的方法——用膠印器或油印機——印出。

特維爾有一個在當時算是廣大的小組網（不下二十個小組）在進行活動，其中若干小組是高級類型的。夏天的時候，有些小組的工作是在伏爾加河上的一些小船上進行的，這就地下活動來說是非常適當的。

除了小組工作以外，我們還在森林里開會。到會的工人已經不是像從前那樣的幾個人，而是幾十個人了。我們的鼓動員們在這些會上講話。

在莫羅佐夫工廠工人的幫助下，我們又和鄉村建立了聯繫，並尽可能把我們的印刷品供給它們。在我們鄉村工作上給予我們特別巨大幫助的就是當時收到的幾本列寧所

著的“告農村貧民書”小冊子。這時期，我們還初次嘗試過要組織幾個社會民主主義農民委員會，可是一時沒有成功。

到夏末，隨著陰雨連綿的秋季的到來，我們一切會議、集會和碰頭都必須從森林移到市內同情我們的當地知識分子的寓所和若干境況較好的有家的工人的寓所里去。但是在城市里，由於我們不熟練於遵守地下活動的規則，失敗越來越多。有一天夜里，不但積極工作的同志們、甚至連若干同情者都被逮捕了去。可是我們幾個處在警察監視下在特維爾等待審訊的人卻沒有遭逮捕。他們只在當夜進行了搜查。這時候我那里不巧有一份我手寫的傳單的原稿。前一天，委員會要我根據從中央收到的一份反宗教傳單（揭露謝拉菲姆·薩羅夫斯基的“聖骨”），寫成一份適合當地情況的短的、比較通俗的傳單。恰好那天晚上很晚我完成了這項工作，而在夜里憲兵就來了。但是在他們闖進房里來以前，傳單已經給我燒掉，只是房里還有燒紙的氣味，這大大地引起了憲兵的注意。他們在壁爐里撩撥了一陣，但是那里的紙片——謝拉菲姆·薩羅夫斯基“不朽的聖骨”腐朽的殘余——已經燒乾淨了。

警察沒有逮捕我們這些被監視的人，他們預料，我們若仍然自由，將會進行恢復組織，這樣他們就可以立即將這組織一網打盡。我們估計到了警察方面的這個詭計。很明顯，破壞以後的黨組織不應當由我們這些被警察所清楚知道的被監視的人們來恢復，而應當由新的人們來恢復，而我

們却应当悄悄地从这地方溜走。

至于我个人，同志們注意到我和“火星报”有从前当过該报代办員的关系，同意使我有机会出國，哪怕是極短的时间，以便在那里就地打听我們党中央發生着甚么事，完了这个任务，然后去工作。我獲得了秘密越过國境所必需的援助，——而在1903年11月底，我就突然出現在日內瓦。



日內瓦——柏林

1903年10月，“俄國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旅外同盟”代表大会在日內瓦开了一連串暴風雨般的會議。在会上，列寧的總結報告剛剛做完，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激烈斗争就立刻爆發了；列寧是受这个同盟的委托出席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这种情况，一个新來的、不久以前还因坐牢而不能从事党的工作的人是难于一下子就了解的。但是实际工作者一旦接触了有关这事的文件，他的注意就被标题为“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紀实”的手抄文件中列寧的几行話吸引住了，那里說到必須把党员的概念縮小，然后才有可能分清工作的党员和空談的党员，从而避免組織上的混乱状态。

关于党章第一項条文——誰得为党员——的問題，实际工作者不能不站在列寧一边。在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情者”的地方，我們的麻煩和誤解有时太多了：对于他們这些人，党的紀律根本是毫不相干的东西；他們胆怯地珍視自己的寧靜和自己的合法地位。讓他們这种人有被認為党员

的可能，对党沒有甚么好处。

这說明为甚么那些附和孟什維克的人，不管他們怎样热烈地为自己的立場辯护，他們的論据总不足以說服人，这也說明为甚么我傾向于布尔什維克。那时候我还不認識列寧这个人，但是自从对我党生活的整个机构起着組織者作用的“火星报”出現的时候起，特别是自从列寧的名著“做什么？”出版以后，一切都和他的名字分不开了。我自己在彼得堡被捕以前一直担任“火星报”代办員，当我收到娜捷日达·康斯坦齐諾芙娜寄來的署名“卡嘉”的密碼信件时，我曉得我是按照他的直接指示工作着的。

我所盼望的时刻终于來到了，我看見了列寧，而看見了他以后，使我确信他正如我所想像的那么一个人，——偉大而純朴。我和列寧头一次見面是在“蘭多耳特”咖啡店；那时列寧常和暂时逗留在日內瓦的同志們在这个地方碰头，这些同志有的是剛开完了代表大会的，有的是剛从流放地逃出來的，有的是剛出獄的。所有这些人都苦于这种暫时的亡命生活，力圖回到俄國去参加秘密工作，可是布尔什維克那时沒有錢打發他們去。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維克把党的中央机关攫取在自己手中，同时也搶夺了和俄國境內各地方党組織联系的全部技術上的条件。他們攫取了印刷厂以及屬於党的資金。

“蘭多耳特”这个地方，我曾經和几个我在党的工作中熟識的火星派同志們去过，他們也是暂时逗留在日內瓦的。这些人是：尼科萊·包曼（他就是格拉奇）、馬克西姆·利特

維諾夫(他就是“老大爺”)、弗拉基米爾·博布羅夫斯基(他就是耶弗列姆),三人全是1902年8月基輔勇敢越獄事件的參加者。除了他們以外,和我一同去過的還有一位我在“北方協會”工作時的老同志——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從彼得堡被流放到了科斯特羅馬的伊萬·亞力山大羅夫(他就是馬卡爾)。由於患有沉重的肺結核,他到日內瓦來養病。

所有帶我上咖啡店去的人,以當時的話來說,都是思想上早已“確定”了的,他們已經成了列寧最堅篤不移的擁護者,他們熱愛依里奇,而提到孟什維克,特別是提到背叛了列寧的普列漢諾夫的時候,他們就大發雷霆。

不言而喻,和這樣的同志們往來,很快地促使我也“確定”了下來,因而在和列寧頭一次會面的那個晚上,我已經完全站在他這一邊,雖然在前一天,孟什維克的領袖們還孜孜不倦地勸我接受“他們的信仰”。

在“蘭多耳特”咖啡店里,我們看見已經有不小的一羣人等待着列寧。不久,他以輕快的腳步在娜捷日達·康斯坦齊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婭陪同下走了進來,他一面走一面和同志們打招呼,隨即開始和我們討論有關黨內形勢的迫切問題。他說,孟什維克正在用誹謗的話毒害黨,散布關於代表大會多數派的種種謊言,破壞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布爾什維克——的威信。黨內所形成的局勢是和思想的動搖及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相關聯的,這些情況已經在代表大會討論黨章第一條時表現了出來。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敘述了布爾什維克所面臨的嚴重局面以

后指出，他对于派遣我們自己的人到俄國去的事还是抱着巨大的希望，把他們派去，是為了讓他們對地方黨組織作正確的報道。但是由於布尔什維克現在資力非常有限，所以暫時只能派少數人去，而其餘的同志們就應當耐心地等待輪到他們的時候。

列寧講完了話以後，我的朋友們就把我介紹給他和娜捷日達·康斯坦齊諾芙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知道孟什維克的領袖們曾經來訪問過我，他開玩笑地問我，這裡有“可怕的列寧”，到這裡來不怕嗎？當他曉得了我沒有感覺任何懼怕以後，就邀我隨便看他去，娜捷日達·康斯坦齊諾芙娜也一起邀請我。很明顯，他用不着費許多時間來說服我。在列寧寓所里同列寧作私人的談話——這是我本來只能夢想的事，因此幾乎在頭一次會面以後的第二天，我就動身到日內瓦近郊的謝舍朗去，那裡，在一座小小的別墅里住着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娜捷日達·康斯坦齊諾芙娜和她的老母親——伊利查維塔·瓦西利耶芙娜·克魯普斯卡婭；這位老太太從來沒有離開過她女兒，無論是在流放的地方，還是當她流亡在國外的時候。

這座別墅的下層有一間廚房，和廚房并排有一間小小的房間，那裡住着經常忙著她的簡單家務的伊利查維塔·瓦西利耶芙娜。一座木樓梯通往樓上兩間比較寬敞的房間。里面的家具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房間里的一張大桌子，和娜捷日達·康斯坦齊諾芙娜房間里的一張比較小的桌子；每間房里還有一張朴素的鐵床，上面蓋著毛毯，几張椅

子，和粗糙釘成的書架子。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桌上堆滿了剪報、手稿、各種蒐集來的統計資料和統計表。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穿着一件敞開的深藍色俄式斜襟襯衣，這給他整個不高而厚實的軀干添上了一種特殊的“俄羅斯的”風度。而且這裡整個環境也和規規矩矩的瑞士生活方式有點不同。莫怪馬卡爾頭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禁不住大聲喊道：“這裡有俄羅斯的風味，這裡令人呼吸到俄國的气息！”

娜捷日達·康斯坦齊諾芙娜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都非常親切地接待我，可是我沒有得到我所希望從這次會面得到的東西。我本打算再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聽到一些我在“蘭多耳特”所聽見了的以外的事物，可是結果呢，他盡問我問題，連在俄國進行的黨的工作的最瑣細的情節他都感覺興趣，他也想知道當我們這些職業工作者入獄以後，倘若有可能的話，我們是怎樣利用這個時間來進行閱讀的。

當他聽我說到1901年我在哈爾科夫坐牢的時候曾經得到一本以伊寧的名義合法出版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件事以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顯然很高興，但是為要隱蔽他自己的喜歡，他開始開我的玩笑，說：“您真不幸，真不幸啊，在監獄的牢房里您還得苦讀我那些又長又枯燥的統計表。我真替您難受啊！”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詳細地詢問特維爾組織的日常生活。他特別感到興趣的是我所提供的這個組織和鄉村有聯系的消息，而當我說到他所著的小冊子“告農村貧民書”在